



● 作者 / Sheri Berman ● 譯者 / 周茂林 ● 審者 / 楊宗興

民粹主義的影響

Populism Is Not Fascism: But It Could Be a Harbinger

取材 / 2016 年 11-12 月外交事務雙月刊 (*Foreign Affairs*, November-December/2016)

本文回顧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，近 20 年之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變化，指出法西斯主義發展有其環境條件，並且警告各國領導人堅守民主機制，勇於解決危機，否則從民粹到法西斯，可能只是一步之遙！

值此右翼運動風起雲湧，威脅歐洲及北美政治體制之際，許多評論家將之類比成 1920 至 1930 年代的法西斯主義崛起。2015 年，法國法院裁定，法國的國民陣線 (National Front) 領導

人勒龐 (Marine Le Pen) 之反對者，有權利稱她為法西斯分子 (Fascist)——這是一項法國人早已頻繁運用的權利。2016 年 5 月，奧地利自由黨重量級人物諾霍弗 (Norbert Hofer) 幾乎贏得奧地利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當時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與德國的希特勒，堪稱是法西斯分子的代表人物。(Source: AP/達志)



總統大選，《衛報》(*The Guardian*) 隨後發刊叩問，「怎麼可能有這麼多奧地利人民，願意和這位半遮半掩的法西斯分子共舞呢？」而就在同一個月，保守主義專欄作家卡干 (Robert Kagan) 在一篇有關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(Donald Trump) 異軍突起的文章裡提出警告，「此乃法西斯主義 (Fascism) 降臨美國的明證。」數十年來，「法西斯分子」已經成為政治霸凌的通稱，但是，從事政情觀察的主要人士認真地以這個名詞來描述政客和政黨，倒是經年累月來的第一遭。

法西斯主義這個名詞最容易使人聯想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（以下統稱「戰間期」，1919 至 1939 年間）的歐洲，當時的義大利和德國，極端政黨以法西斯運動為名贏得政權，並且將烽火蔓延到許多歐洲其他國家。儘管法西斯分子在各國的定義有所出入，但是渠等均強烈反對民主，仇視自由主義，也高度質疑資本主義。法西斯分子同時也相信「國家」——通常以宗教或種族為界線——是所有忠誠公民最重要的身分來源，因



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，其濃厚的極右立場，不時在法國社會引起波瀾，而且還獲得一定的民意支持度。(Source: AP/ 達志)

此，法西斯分子矢志革命，寄望以一套新的政治秩序取代自由式民主 (liberal democracy)，在強人領導下，致力於孕育統一而淨化的民族國家。

儘管現階段右翼民粹主義者和戰間期的法西斯分子相比，有若符合節之處，但是兩造間的差異也甚為明顯。更重要的是，時下評論人士的類比式說法，往往無法解釋這批病態政客和黨羽，是如何地和戰間期的法西斯分子一樣，逐漸習慣於這種革命式的、能鬆動民主

基礎的一波波運動。為理解這個變化過程，僅僅針對右翼極端團體所揭櫫的綱領、訴求、或政客的人格特質、或渠等所屬群眾之傾向，是不夠周延的。人們反而必須謹慎而宏觀地將政治環境納入考量。民主菁英人士和政治機制，因為在戰間期無力因應社會所出現的重重危機，導致了法西斯分子從光譜邊緣的極端角色，一躍成為歐洲主體的支配者。儘管今天的問題非同小可，但是西方社會待處理的議題，絕非屬於 1930



年代經濟大崩潰那樣的類型。因此，對於法國勒龐、美國川普及其他右翼民粹主義者，貼上個「法西斯分子」的稱號，與其說是澄清了概念，毋寧說是模糊了焦點。

法西斯運動的源頭

法西斯主義和時下的右翼運動如出一轍，當初也是全球化浪潮進入激烈階段後的產物。在 19 世紀晚期進入 20 世紀初之間，資本主義劇烈地重塑了西方社會，摧毀了舊有的社群、專業及文化規範。在此一階段也出現了大批的移民潮。新興農事技術，以及進口的低廉農糧產品，使得偏鄉小農毫無立錐之地而湧向城市，而窮國的人民為求生計，亦朝向較富有的國家移動。

當時轉變所帶來的衝擊一如今日，讓許多人既覺震驚，又感憤怒，此股情緒正好成為自稱握有良方之新一批政客崛起的溫床。而在這批政客當中，更以右翼民族主義者顯得特別亮眼，後者誓言保護國民，免於外來勢力和市場競爭的邪惡影響。當時的法西斯運動橫掃西方國家，從阿根廷橫跨至奧地利，更從法國擴散到芬蘭。法西斯分子在某些國家內多所破壞，也對某些國家政策制定做出牽制，儘管如此，在 1914 年之前，法西斯主義仍未能從根本處挑戰既定的政治秩序。換句話說，法西斯運動的政策和訴求，並不足以坐實其具有危險性或是革命性的說法，這一切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露出端倪。

上百萬歐洲人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而遭殺戮、身體重殘、精神受創，而歐洲大陸本體和經濟也泰半荒廢。於戰爭爆發初期，英國外交大臣

格雷 (Edward Grey) 的感嘆言猶在耳，「整個歐洲的燈火將行熄滅。在吾人有生之年將不會再看到其重新點燃。」事實上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，整個西方生活方式早已是昨日黃花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於 1918 年結束，然而苦難卻持續到戰後。歐洲的四大帝國——奧匈、德意志、鄂圖曼、俄羅斯——紛紛於戰時或戰後崩解，衍生出許許多多的新興國家。這些國家不僅欠缺民主經驗，偏偏原本以混居共處為特色的各個族群，又是利益相左，鮮有交集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包括德國、西班牙在內的歐洲老牌國家，其舊式政體基於民主轉型而讓步，且因之解體，但是這批老牌國家也一如新興國家般，欠缺人民治理的經驗——還有推動人民治理時，所必要的習性、常規和機制。

更使上述情勢雪上加霜的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緊接而來的並非是和平重建，卻是無窮盡的社會、經濟問題。新興民主國家勉力進行著復原，將數百萬軍人重新導入社會，重建起飽受戰爭蹂躪的各項經濟活動。奧地利與德國由於戰敗，必須承擔羞辱性的待遇，接受一種懲罰式的和平，兩國自此飽受惡性通貨膨脹之苦。橫互歐洲全境，目無法紀、暴力滋生的現象，不旋踵間已成為民主國家失去掌控治安及領土能力的通病。義大利幾乎有整整兩年的時間，工人佔據工廠，佃農奪取土地，左翼和右翼民兵爆發多起武裝衝突。德國威瑪共和政府曾遭遇激烈的左翼和右翼起義事件，迫使該國政府派出軍隊，奪回城鎮和行政區。

儘管民主國家遭逢上述林林總總的困境，法西斯主義最初終究仍屬於邊陲勢力。在第一次世

界大戰戰後，義大利舉行的第一次選舉，幾乎沒有人投票給法西斯團體。1923 年希特勒策畫的「啤酒館暴動事件」(Beer Hall Putsch) 不僅草草收場，希特勒和其共謀黨羽還以入監服刑落幕。問題不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消逝。此時的歐洲，經濟景況已積重難返，街頭衝突、暗殺，以及各式社會脫序行為，持續侵襲著許多歐洲國家，簡言之，在 1920 年代末期結束前，許多歐洲人對民主的信心已遭嚴重地削弱。

民主政體的危機

緊接著全球發生了經濟大蕭條。但是經濟大蕭條真正的災難，與其說是該事件所帶來的經濟困境——儘管這已堪稱燃眉之急——毋寧說是以民主機制因應危機的效果不彰。欲了解這兩造間之不同，人們不妨比較一下德國和美國在此事件上後來的結局。德國和美國是受到經濟大蕭條打擊最為慘重的兩個國家，失業率、企業倒閉率、生產下滑比例等數字，紛紛攀升到最高點。相對於德國威瑪

政府在納粹黨團猛烈攻訐下應聲垮臺，美國的民主制度竟能渡過難關——儘管美國的確也出現了某些準法西斯主義領袖，例如路易斯安那州政客朗 (Huey Long) 和透過電臺廣播傳教的科林 (Charles Coughlin) 牧師，但是，為什麼美國能度過危機，而德國不能？

答案來自兩國政府對這場經濟危機大相逕庭的因應途徑。德國領導人對紓解社會困境毫無作為；事實上，渠等推動了各項撙節政策，卻導致整個經濟衰退現象變本加厲，尤其是失業率惡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。突兀的是，即使是主要的反對黨，也就是當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，在提出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上，也表現地卑躬屈節，軟弱無力。美國的民主機制和決策規範，相對而言較為久遠，也反映出其較為厚實的一面。但是遏阻法西斯主義蔓延的另一個同樣關鍵因素，則是羅斯福 (Franklin Roosevelt) 總統，他堅稱政府有能力，而且一定要協助美國公民，作法則是奠定現代福利國家的基礎設施。

不幸的是，對歐洲而言，多



第一次世界大戰重創了歐洲地區，其後也造成無止盡的社會、經濟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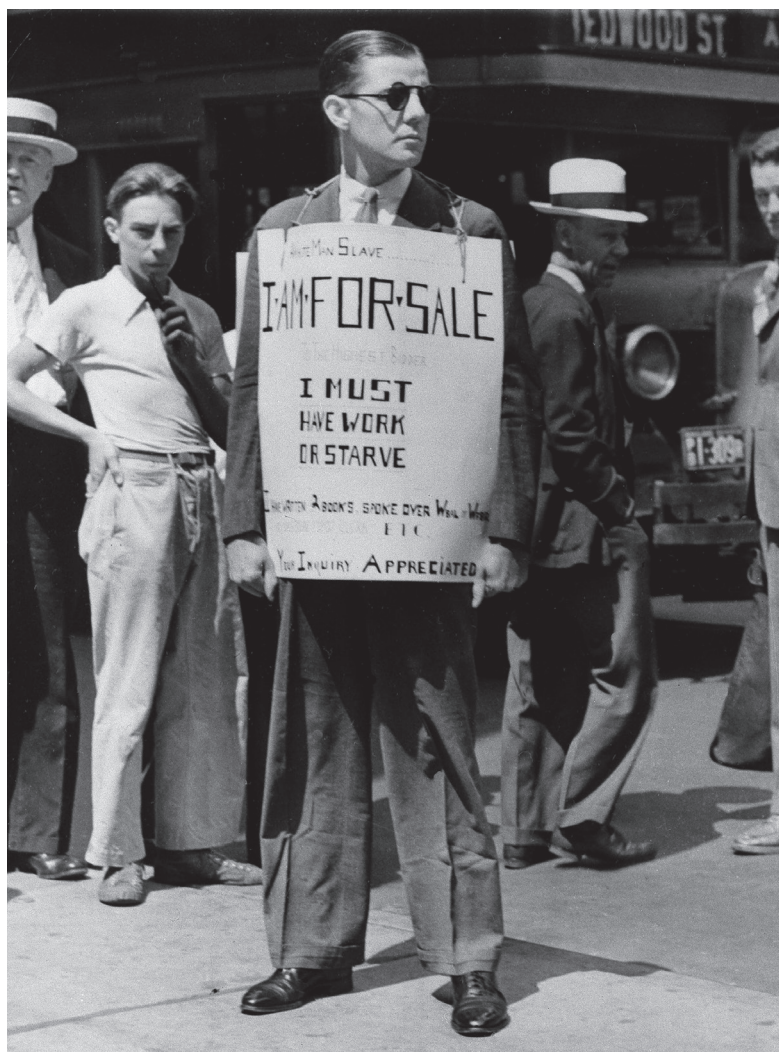
(Source: AP/ 達志)



數政府經證明不是力有不殆，就是不願意主動因應當時的經濟危機，再者，絕大多數的主要政黨提不出可行的對策方案。情勢發展到 1930 年代初期，主張自由主義路線的許多政黨在歐洲大陸早已遭邊緣化；渠等信仰市場機制，不願意對資本主義的負面影響採取積極行動，外加對民族主義的敵視立場，在在給予選民一種完全和戰後事實面脫節的印象。當時，除了斯堪地那維亞（Scandinavia）國家外，大多數循社會主義路線的政黨也同樣狼狽不堪，渠等只能告訴選民，一切等到資本主義完全垮臺後，生活就可望獲得改善——換句話說，值此過渡階段，渠等能做的有限，只能觀望。（社會主義政黨對有關國家身分及多項傳統規範流失等議題，竟表現出漠不關心或敵視立場，這在社會極度動盪時，乃是政治上另一不智之舉。）而高舉共產主義的政黨，的確是提出了引人矚目的行動方案，試圖改變現狀，但是由於完全聚焦於勞動階級，並採取仇視民族主義的路線，渠等訴求也是狹隘難行。

綜上所述，在絕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中，能夠利用民主信心滑落之際，又逢經濟大蕭條環境而勝出者，惟法西斯主義路線莫屬。法西斯分子一方面強力抨擊著政府當局的秩序，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有力的替代方案。渠等首先批評民主是無效率、不敏感、無權威的制度，進而倡言要終止民主。渠等引進的新制度將以國家保護人民，使人民免於資本主義無止盡的摧毀力量，做法則是創造工作機會，擴張福利國家（但是只為「真正的」公民提供福利），消滅一批經認定為投機的資本主義者（通常指猶太人），並且將資源挹注於另一批能為

國家利益服務的企業。法西斯分子承諾要消弭內部的分化衝突，避免國力受挫——手段並不難猜，不外就是排除異己。此外，法西斯分子還宣稱要重振長期以來屢遭外部勢力搗毀的光榮感，找回結社的目的。以上這些立場使得德國、義大利及其他地區的法西斯主義，更容易突破階級劃分，



1929 年到 1933 年間的全球經濟大蕭條，除了反應出人民失業、經濟困境等問題外，還凸顯民主機制對於危機的處置失靈。（Source: AP/ 達志）

同時吸引光譜兩端的激進選民。儘管在法西斯政黨的支持者裡，相當高的比例是男性、出身社會中低階級的民眾，還有退伍軍人，但是在戰間期的歐洲，渠等獲得了較其他政黨更普遍的支持基礎。

當時的法西斯分子固然佔盡以上各項優勢，但是仍然欠缺獨當一面、奪取政權的實力，還需要傳統保守主義者的分進合擊。這批保守主義分子——基於固守傳統菁英勢力，打擊民權之企圖——本身並不具備廣大民意基礎，轉而期望能利用法西斯分子的群眾魅力，達成渠等最終意圖，所以傳統保守主義者在幕後支配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，並且極有把握地認定，到頭來可以操縱或驅逐這些人。然而，保守主義人士卻沒有料到法西斯分子也採取著同樣的算計。1933年，希特勒受命擔任總理後，隨即拔除了已往結盟的保守主義分子，其精準的眼光洞悉了繼續與保守主義路線合作，將是法西斯長期革命大業的絆腳石此一現實。墨索里尼早於1922年即出任義大利總理，完全鞏固其權

力所耗的時間稍久——但是，最後也一樣是拋棄（或是直接暗殺）了許多扶植其為「領袖」（Il Duce）的傳統保守主義黨派人士。

對當代的啟示

藉由以上文獻的映射，吾人對法國勒龐、美國川普，以及時下其他右翼激進人士的解讀是什麼？這些右翼運動人士和戰間期的法西斯分子當然有著契合之處。首先，他們都指陳現任民主領袖效率不彰、反應不力、虛弱無能。其次，渠等皆承諾要培育民族精神，抵禦敵人侵犯，喚醒飽受外族蹂躪的人民意志。還有，他們都保證為「人民」發聲，此處所謂「人民」則是按宗教或種族來界定。

然而，若說今昔極為相似，則不同之處就更為明顯。最明顯不同之處，在於今天的極端主義分子聲稱欲改善民主，而不是要埋葬民主。渠等儘管責難當代民主功能不濟，但並未提出替代路線，而只是語焉不詳地承諾著，要使政府更強、更有效率、更具反應力。

與其說是法西斯主義，毋寧

說民粹主義路線才是描述現階段右翼極端分子較為貼切的寫照，因為民粹主義者向來標榜要為人民發聲，抵抗腐敗、墮落、與民氣脫節的在位菁英和政治機制。換句話說，民粹主義者本質上反自由主義，卻不反民主路線。這可是一個關鍵性的分野。如果現階段的民粹主義者取得政權——即使右翼民族主義也結盟其間——只要是一個堅守民主的社會，仍可能以選舉方式將民粹主義者逐出政治舞臺，再次翻轉政局。事實上，民主最大的優勢可能就在於此——使國家有機會從錯誤中重回正軌。

但是，區別今日右翼激進黨派和當年法西斯分子一個更重要的面向，是更大的周邊環境因素。雖然當代問題繁雜，各國人民也怨聲載道，西方社會並沒有遇到上世紀戰間期中，足以引起動亂的任何問題。托洛斯基（Leon Trotsky）曾為文指出，「單憑剝奪感，並不足以導致暴動；否則，廣大的群眾早就天天暴動了。」托洛斯基的邏輯也一體適用於法西斯主義的發展。至少在美國和西歐社會，有著



根深柢固的民主理念和規範，今天的政府治理和1920至1930年代間不適任的領導團隊相比，相去程度不可以道里計。更重要的是，民主程序和機制、福利國家、政治黨派，以及穩定的公民社會不斷地賦予公民各種管道，得以表達顧慮、左右政情、滿足需求等需求。

基於上述原因，當前美國和西歐社會右翼極端分子和上世紀戰間期的那批同道相比，能打的牌並不多、牌運也不夠好。（而在另一方面，由於民主規範尚待成長，機制仍未健全，東歐和南歐的右翼運動勃然而興，已經和傳統法西斯主義相當接近，例如希臘的「金色黎明」[Golden Dawn]，以及匈牙利之「更好的匈牙利」[Jobbik]運動）。學者斯科克波（Theda Skocpol）已強調過，革命運動不盡然導致危機；但革命運動者卻會利用危機。易言之，民主制度真正的威脅，是民主政體本身無法因應當面挑戰，出現了可遭詐取權力的那一刻。

當然，情況有可能變化。現階段美國和西歐政府沒有出現真正的法西斯主義運動，絕非表示人們可以安適自得。戰間期的文獻顯示，西方社會應該更加關注那些破壞民主制度的問題，其次才是右翼民粹主義分子。使勒龐、川普等世界級人物敗選退出舞臺，不構成實質威脅的最佳途徑，係確保民主機制、各個政黨、政治人物更能針對人民的需求做出回應。以美國為例，與日俱增的社會不平等、停滯多年的工資水準、老化而凋零的社區、國會的僵局、政治獻金淹沒大選等現象，是誘發人民支持川普較為直接的因素，卻不盡然是川普聲稱的個人魅力，或是所謂的支持者威權

傾向。如果美國能夠著墨於上述問題，一定有助於避免下一個川普的崛起。

歷史同時也顯示，保守主義者在採取右翼民粹路線時，應特別地戒慎恐懼。共和黨主流人士針對選民舞弊、選舉造假等四處放話，並且質疑歐巴馬總統的愛國情操和民族認同等行徑，本意是爭取極端族群的選票，但卻是一齣高度危險的戲碼，因為這種競選詞彙足以煽動支持渠等的公民，對政客產生畏懼，對政治制度失去信心，最終導致民主基礎的動搖。和戰間期的那批政客如出一轍的是，美國現在的這批保守主義者也可能不斷地爭取民粹主義政客之青睞，偏偏後者對保守主義所主張的政策、民意基礎或運作的機制，充其量只是敷衍已對罷了。

右翼民粹路線——事實上，任何民粹主義——是民主效能不彰的症候；法西斯主義及其他革命風潮是民主政體出現危機後所衍生的結果。然而，任何政府如果不積極作為，來處理類似美國和歐洲目前發生的諸般社會和經濟問題，如果主流政客及政黨不能拿出貼近民意的施政措施，再加上保守主義分子一味地煽動恐懼，卻對極端勢力不聞不問，那麼西方社會可能很快便會驚覺，其正從右翼民粹路線走上法西斯主義之途。

作者簡介

Sheri Berman 係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 (Barnard College, Columbia University) 政治學教授。

Copyright©2016, *Foreign Affairs*.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-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.